

战前马华小说中死亡叙事模式图景

黄淑贞，郑庭河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摘要

战前南来华人处在风雨飘摇的历史社会环境下，无论是旁观他人的死亡或是自己面临死亡的威胁，死亡带给他们的是直接的冲击。死亡与生命的思考和念想伴随着他们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死亡叙事自然成了战前在地经验的重要命题。本文即是在这样的启发下，企图透过在战前马华社会历史背景的映衬下，细致地归纳、分析和梳理战前马华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模式的类型。对于死亡叙事模式类型，本文认同王小环的观点，同时认为其符合战前马华文学死亡叙事文本的真实情况，因此将战前马华死亡叙事模式类型分为三类，即身体死亡、精神死亡以及生命自省。

关键词：战前马华小说、死亡叙事模式、身体死亡、精神死亡、生命自省

A View of Death Narrative of Pre-war Malayan Chinese Novels

OOI Soh Chen, CHING Thing Ho
Chines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The pre-war overseas Chinese in Malaya were in a stormy historical social environment. Death brought them direct impact no matter it is regarding the death of others or they themselves face the threats. For the thought of death and life stayed along with them through the difficult years, the death and dying narrative naturally became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their on-site experience in Malaya during pre-war. Inspired by th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mmarize, analyse and sort out the types of death narrative modes in pre-war Malayan Chinese novels by referring to the background of Malaya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For the type of death narrative modes, this paper agrees with Wang Xiaohuan's point of view,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meets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death narrative text of Pre-war Mahua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types of Pre-war Mahua death narrative mod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physical death, mental death and introspection of life.

Keywords: Pre-war Malayan Chinese Novels, death narrative mode, physical death, mental death, introspection of life.

一、绪论

根据颜清煌、王庚武、孔力飞等历史学者的考察，战前从中国南渡来到马来亚的华人当中，以苦力占大多数，其余则由商人、文化人等组成，这些苦力、商人与文化人基本构成了战前马华的移民社会形貌。中国南来华人离乡背井、花果飘零，同时还要抵御南洋的自然灾害、天气、疾病，适应南洋的当地风土、政治、经济等社会状态，苦力们更需在恶劣的环境下从事体力劳作，生活受尽压迫、剥削和折磨，由此可见这些南来移民背后都有一段辛酸史。如今时过境迁，我们也许很难具体地回溯与想象当时南来华人的困境和心境。但可以理解的是，在当时身处这样恶劣的环境，这些南来华人不仅是身心备受挫折，更是时时刻刻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从这样的思考出发，我们不难找见战前南来华人处在风雨飘摇的历史社会环境下，无论是旁观他人的死亡或是自己面临死亡的威胁，死亡带给他们的是直接的冲击。对于死亡与生命的思考和念想伴随着他们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死亡叙事自然成了战前在地经验的重要命题。

纵观学界对于马华文学在死亡叙事的研究仅停留在为数不多的期刊论文上，并未有深究的研究，给本文留下了巨大的开拓空间。中国文学、台湾文学以及西方文学学界对于死亡文学的研究可谓海量，对于文学死亡叙事或书写研究的积极意义也给予肯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今中外对于死亡叙事的文本研究，大多是针对个别作家作品的死亡叙事作出的研究，而以整个历史环境为背景的死亡叙事研究相对地缺乏。本文即是在这样的启发下，借助方修修订的《马华新文学大系》观察战前至抗战前的小说作品，企图透过在战前马华社会历史背景的映衬下，细致地归纳、分析和梳理战前马华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模式的类型。

对于死亡叙事模式类型，本文参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王小环（1973 - ）在其《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研究综述》的说法，他指出，死亡包含至少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现实所带来的生活层面的表现，身体的死亡，生命的终结；其次是精神层面的死亡，精神是与身体与感性相对立的理性，如传统文化危机促使作家们对文化的反思就是这一层面的内容；最后是灵魂的自省，哲学层面的，鲁迅的白话文文学创作就开了先河。（王小环，2012）

本文认同王小环以上的观点，同时认为其符合战前马华文学死亡叙事文本的真实情况，因此依照以上观点，将战前马华死亡叙事模式类型分为三类，即身体死亡、精神死亡以及生命自省。精神死亡虽不比身体死亡象征着生命的终结，但两者对个体生命同样具有摧毁性的作用，故对于身体和精神死亡的叙事，皆成为本文的关注点；而生命的自省是藉由死亡事件而发出对生死寓意的体悟。

二、战前马华社会：为生存而出走

本论文有意就战前小说的死亡叙事进行一番考察，主要是为突显战前马华文学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某种社会与精神面貌，虽无法突出个别作家对于死亡叙事的艺术风格与思想感情而有其局限性，但却可体现出战前马华社会作为移民社会的生死苦楚与困境，也可就该独特历史条件下文学中的死亡叙事模式作出梳理。因此，为了解与挖掘战前马华文学中的死亡叙事，我们不得不从作为移民社会的战前马华社会说起。

战前马华社会属于移民社会，由华工、华商和少部分知识分子组成。杨松年（1986a）表示，华族自十六世纪以后移居南洋的人数迅速增长，然而，中国人真正第一度大量南来移民至马来亚和新加坡是始于十九世纪末年。十九世纪末中国受到的外侵，政治经济发生了危机，民不聊生，工农生计和基本生存条件严重受到影响。种种的原因迫使中国沿海地带人民纷纷迁移他地，进而影响了与周边国家的连带关系。适时，西方帝国和资本主义在新马的扩张，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沿海地带的人民藉着贸易出洋的便利，乔迁新马。这一“推”一“拉”的张力，使得19世纪末开始，华人纷纷不计离乡背井涌入新马一带，在异地建立起在地生活。

新马一词在战前统称为马来亚¹，直至抗战期间，马来亚直属英国殖民地，因此，战前马来亚也被称英属马来亚。英国殖民马来亚期间，把马来亚的行政区域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1826年设立，包括新加坡、马六甲和檳榔嶼，是当时马来亚政治、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华人人数占多数，俗称为三州府；二、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1876年设立，包括霹靂、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橡胶业和锡矿业最为发达，集中了大量华人劳工，俗称为四州府；三、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1914年设立，包括柔佛、玻璃市、吉兰丹、吉打和丁加奴（现称登嘉楼），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华人人数相对较少，俗称五州府。（范若兰，2005，页1）

我们从以上的华人人口分布发现，华人大多集聚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海峡殖民地，而马来联邦则因为橡胶业和锡矿业的发达而吸引了大量的华工。至于相较发展落后的地区如马来属邦则较少有华人居住。综合中国近代移民史和马来亚华人分布区域的考察显示，自19世纪以来，中国华人移民至马来亚，经济条件是主要的原因，或是他们南来后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有者甚至是为了满足最迫切的生存需求。

根据历史学者们对于近代中国华人出走主要原因的考察，除经济为主要因素之外，还有政治因素，即是上文提及的“推力”，借助移民逃离中国的境内战乱和外国势力的侵略而亡命天涯。即使已在异地马来亚建立起生活，但作为离散群体的华人，无论是经济、政治或其它因素，近代中国华人移民中的飘泊和“流亡”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死亡”和“逃亡”的意味，而呈现出茫然未知前途与个体生命坚毅精神之间的挣扎与搏斗。

到了20世纪初，华侨的经济地位随着马来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提高，但仍然蒙受种种压迫。在英殖民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官方档案对诸历史事件的记录。但官方档案只是由上而下的历史性记录，从这些记录当中，看不到下层人民的感受和看法。因此，本文将以文学研究的方式，借助刊登在当时报刊上的文学作品更为接近民众的便利，从日常生活中剖析社会的死亡现象以及人民的看法和感受，追问究竟在何种情形下，诱引战前马华文人书写死亡？而他们笔下的死亡叙事又呈现出怎样的风貌？

¹ 马来亚曾经是英殖民地，在英殖民期间主要有两种称谓，一是马来亚，二是新马。马来亚和新马（或星马）之称谓皆有在各种研究著作中出现，然而官方文件称之为“马来亚”。同时，在战前文学中，新马两地不分家，故笔者认为马来亚更符合历史和文学史的语境。因此，本文采用“马来亚”这一称谓。

三、副刊：战前马华文学的摇篮

战前马华社会多由不识字的华工组成，而死亡叙事文学得以考究，得益于当时的马华移民社会中的小知识分子对于文学的坚持和思想传播的任重道远，同时报刊及报章文学副刊作为文人的发表园地也是功不可没。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些文学作品，更能够让我们贴近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苦闷，理解他们的挣扎与困境。报章除了刊登新闻之外，报章与副刊的创刊还滋养着战前马华文学，副刊更是马华战前文艺的摇篮，可以说，如果没有报章副刊，便没有了当时丰富的文学遗产。战前马华文学由于出版业并未兴起，当时的文学以报章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杂志为主要的发表园地。报章副刊和期刊杂志不仅是推动新马华文文学的重要力量（杨松年，2000，页22），更形塑了战前马华文学的基本规模。

根据新马华文文学史学者王慷鼎（1936-2011）和杨松年（1941-）整理的〈新加坡战前华文报刊系年初稿〉（南洋商报，1982年2月22日，页29）和〈马来亚战前华文报刊系年初稿〉（星洲日报，1982年3月1日，页26），从1815年至1942年间，新马两地出版的报刊共有222个之多²。在这浩瀚的战前报章副刊当中，方修（1922 - 2010）从中挑选出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理论等文学作品，整理并收录在其主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

战前马华文学受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白话文的普及运用上，同时还体现在当时所提倡的文学思潮上。写实主义在战前马华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当时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以致现实主义在马华文学中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屹立不倒，横跨了马华战前文学、抗战文学和战后文学，直至70年代后才产生了变化。方修在为“马华新文学”作出定义时提出了两个主要的要点，一是以马来亚³为主体的文学，反映马来亚现实，表达当地人民的思想与愿望，富有南洋色彩；二是“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指的便是以中国五四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为指南的创作精神。方修对于马华战前文学的定义也许包涵了方修个人的主观意念，忽略了战前马华作家在作品中个人的感情和意识，但也提出了一个历史性面貌：现实主义在当时文学思潮和创作中引领主流的地位。随着移民时间的推移，马华战前文人对于当地的感情也逐渐加深，关注当地的社会以及注重文学中的南洋色彩。而无论南来作者关注的是祖国或是马华，战前马华文学的推进，多少具有作者批判现实不公的思想意识。方修和杨松年的厚重的论述和整理，为笔者了解战前文学史状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笔者也努力在前人的有限下做出填补。在方修修订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既有基础下，本文透过整理和分析死亡叙事模式，企图侧面探勘战前马华社会时代精神的面貌。

在中国“五四”白话文学的提倡上，副刊将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介绍到马来亚，影响了本地白话文创作的情况。同时，副刊也提供了文化人在地创作的园地，使马华文学成为“可能”。我们可以说，报章副刊代表了战前马华的“文学场域”，同时也成为马华社会的独特文学传统。报章副刊是为战前马华文学独有的生存生态现象，其中的文学作品也有助于填补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困限，突显了历史下的更细微的面貌与日常，尤其是死亡这种被历史忽略的一面。

² 其中新加坡有163个，马来亚半岛有59个。

³ 方修称星马。

四、战前马华小说中的死亡叙事

我们综合中国移民出走的过程和路途的际遇，以及在马来亚的在地经验，不难发现很多从中国南来的华人常常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们从出走开始，便开启了他们亡命天涯的流亡命运，前途茫茫之感常使他们感到无力；而他们在船上和马来亚的在地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南来华人在生死间徘徊。这些南来华人生命的摧残，在推崇胜利者的历史中可谓是悲惨的寥寥数页，着墨不多，但对文学而言，却是灿烂的冲击，点燃了战前马华文学的火焰，为文学提供了大量的瑰宝。

黄锦树以方修和杨松年的马华文学史架构说明，马华文学的发展与大马华人政治意识及政治身份的转变息息相关，也攸关华人的生存境遇（黄锦树，2012，页59）。据上文提到南来华人的生存状况，我们还可以由此推断，战前马华文学不仅仅与政治生存境遇，同时与经济上的生存相关联。若我们从死亡叙事的角度剖析战前马华文学作品，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呼应着当时马华社会的生死际遇和感受。

从上述战前马华历史叙述与副刊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死亡不仅是个别事件，更是一个个现象。死亡从来都是忌讳，尤其在华人社会中、在华文文学里，无不如此；在马华战前社会中，情况更是如此。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中，人们害怕着死亡的到来；然而知识分子在死亡的冲击下，对于死亡与生命的思考和念想伴随着他们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死亡叙事自然成了战前马华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创作灵感。这些作家透过报章副刊和文艺期刊杂志发表这些作品，表达思想。本文借助方修修订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中的小说作品，从死亡角度剖析，可以观察当时社会的某个部分的精神面貌。考察战前马华文学作品中的死亡表述，可大致把死亡叙事模式分为以下三类：

（一）生命躯体的死亡叙事

战前马华以生命躯体出发的死亡叙事可说是最普遍的死亡叙事，其中提及的包括对各种非自然死亡原因的描述，如意外死亡、他杀、自杀、病苦饥饿致死等。这类生命躯体死亡叙事多借死亡事件描写生活疾苦，表达对悲惨生活的压迫与生存困境中的无奈，其中多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

这些文学作品透过死亡叙事文本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进行的描写，多以反映经济条件的恶劣为主。如呆伯的〈偷生日记（节选）〉中，叙述主人公山穷水尽，“已穷到见骨了”，只好写信向朋友求助，信中叙述自己的苦况时表示自己“已陷入经济恐慌”：

倘若你不快给点西江之水来，救救待死之鱼，吾命休矣！嗟嗟！吾确已陷入经济恐慌之绝境了！奈何！奈何！（方修编，1970，页226）

文中主人公以鱼和水的比喻，形象描写自身经济状况的恶劣，已几乎到了绝境的地步，直接威胁着自己的性命。浪花的〈邂逅（节选）〉中也有类似的叙事，主人公哭诉生身爸爸已年老仍当人力车夫，营养不足，又经常有生命危险，“一不小心便很容易送掉生命”（方修编，1970，页277）。人力车夫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生活费，不仅需要抵御天气的恶劣，还有可能不小心被马路上的汽车撞伤而断送性命。文本多次提及担心爸爸的安危：

他是衰老了，生活的铁鞭快要使和生命隔开了啊！……而且日常的滋养不好，恐怕性命不久了吧。（方修编，1970，页276）

追根究底，影响着父亲安危的“生活的铁鞭”固然就是经济的压迫，文中也点出作为人力车夫的父亲收入低微，以致“日常滋养不好”而威胁性命。文中以主人公的担忧为出发点，以情感的体验代入叙事，如今读来，仍能感受战前马来亚华工以性命和劳动力换来微薄收入的苦况。战前马华文学对于华人三餐不继、危及性命的苦况叙事不计其数，如槐才〈血泪〉中也描述，“赤手空拳的我，能够挣着多少钱呢？不饿死已算是幸运了！”（方修编，1970，页182）。

文学作品中对于战前马来亚华人饱受经济压迫的描写，在失业率高涨的时期尤为多。浪花〈生活的锁链（节选）〉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因胶价跌落，洋人辞退了不工人。

年老的，因可营养不好再加上南天气的燥热，和失业的痛苦，还有鸦片瘾不时发作，便一个个的相继死亡。（方修编，1970，页289）

1929至1933年全球经济风暴，马来亚并无幸免于其中，主要原材料如橡胶和银价格下泻，影响多个领域，导致主要以华工和华商组成的战前马来亚华人社会备尝失业和破产。上面叙述华工三餐无法温饱以致营养不足，一旦失业，情况更为恶劣，影响甚广，致使当时人们“一个个相继死亡”。如同慧聆在〈转变（节选）〉中，叙述主人公老义失业，向头家求得管理杂草的工作，收入极其微薄“仅堪维持一日口粮”，但却使老义“从九死一生中自救了出来”，因为“究竟比较那街头巷尾，沿门捧钵的乞儿，胜过许多呢”（方修编，1970，页312）。可见失业是战前马来亚华人的噩梦，吞噬了无数华人的性命，在文学中也多有反映。

在以死亡描述对现实或经济苦况的不满时，文本也多有对贫富差距对比的体现，即穷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关系。如浪花的〈邂逅（节选）〉，叙述主人公母亲替人缝衣服，“手工艺敌得过吃人的机器么？那吮吸无产者的浆液的机器？”（方修编，1970，页276），以及好友父亲被汽车撞到伤毙，“生命断送在机器上了”（方修编，1970，页279）。呆伯的〈偷生日记（节选）〉也叙述：“世上的人，那几个能体贴到无产者的可怜？他们的人生观是：穷者应该吃粥，富者自然眠铁床。我不知他们能体贴到连粥汤都没得吃的人，作何感想。”（方修编，1970，页224）〈转变（节选）〉中更是直白地如是描写：

像他现在的命脉，操诸那吃人的头家手里去了。只要一开金口，便好似圣旨一样，生死都随之。他的肉体，简直是无价值，因为劳力已被榨取尽了！（方修编，1970，页312）

头家或工头对于华工的欺压，在战前历史上、文学上，是不断出现的命题。而华人，尤指华工，对于资本家的厌恶，除了由于五四白话文学极力提倡为底层人物书写，同时主要出于革命文学对于无产阶级的同情，以致文学上多有以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斗争，“吃人”的命题更是反复出现在文学里。文学作品中出现资本家对于华工的生死的操纵，除了出于文学上的修饰外，更多许是由于头家掌控穷人的经济来源，而经济来源是直接影响了华工生死的主要因素。除了上文描述头家对于华工生死的操纵，还有文学作品如浪花〈生活的锁链（节选）〉描写工头或头家对于工人的草菅人命，皆是以金钱或权利与性命放在同一平行线上以进行叙事。

除了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描写经济不景气之际劳动者失业外，部分作品也尝试从不同的视角描写经济不景对资本家的影响，甚至造成死亡。在《马华新文大系》中，此类作品多出现在1932-1934年间，如〈雪影〉和〈峇峇与娘惹〉。〈雪影〉讲述割胶少女雪影被园主李阮收买作姨太太，后李阮因胶价下滑、经济不景而破产，便开始对雪影非人凌辱。雪影最后用手枪威胁李阮付遣散费不果，枪毙了李阮。〈峇峇与娘惹〉描述买卖树胶老商人一家的生活，老商人破产后，乱伦的儿女——峇峇与娘惹买凶杀父，成为一家之主，媳妇在侦查此事后告发他们，继而离开这个家。从此我们可以得见战前作者在胶价下滑之时对资本家破落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两篇文章皆描写资本家被身边人——即姨太太和儿女所杀害，不得善终。作品虽描写资本家，也同样以战前马华社会的经济不景为叙事背景，但从死亡叙事的角度来看，可说同是为劳动者而写的作品。

除此之外，严峻的现实环境也使当时人们产生死亡是解脱现实苦况的想法。如慧聆〈铁牛〉便认为死是目前恶劣状况的解脱：

……，如果到了像他这样的田地：只有垂着两手，延喘着，等待那死神的降临，带领他到极乐国里去。真的，穷人只有死才是快乐，拖着被雇佣的肉体，在世上活剥皮，倒不如死得干净。死，已经是穷人们第一件快乐的事了。（方修编，1970，页300）

槐才的〈血泪〉也有类似的描述。小说中的主人公锡波因反抗而被枪弹所伤入院，后在医院遇见青梅竹马的女主碧玉，并在叙述其遭遇时，如此表示：

我在这里被XXX压迫得不能过人的生活，所以便拼命的反抗，猜得到无情的弹丸在我的臂部和腿穿过。我是没希望的了，但我这样的死幸福得很，……。”（方修编，1970，页182）

文本中以叙述死亡是“幸福”和“快乐”并非本意，而是因生活遭受苦难重重、在现实环境无奈之下，一种补偿式的情感抒发，期望死后获得解脱与向往的快乐和幸福。

（二）是对醉生梦死、意志消沉和苦闷等精神死亡的反映和抒发

精神是与身体与感性相对立的理性（王小环，2012），因此，精神死亡是相对于肉体死亡的状况，即指人的生命还活着，但自身精神和理性已丧失，思维陷入周而复始的死结，高级思维活动已停止。在战前马华文学中，也出现不少对精神死亡

的叙事，文学作品中可见人们对于生活的无聊和烦闷的描述，充满“厌世”的颓废色彩。如冷笑的〈热闹人间〉叙述一个参加过中国北伐革命的青年，只身孤影来到南洋之后的种种感受。主人公冰心是个知识分子，来到南洋后当食客在门下寄食，“孤身只影，人地生疏，身世的飘零”而使他烦闷得“差不多变了一个神游病者了”，更厌世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寄生虫，早早结束了他，还胜于偷生苟活”，并称自己为“枉有生命的僵尸”（方修编，1970，页195-197），活脱脱就是一个形在神不在的精神死亡状况。

细观这些对烦闷、无聊生活的叙事，都与环境的转变有关。中国华人移民到马来亚后，由于环境的转变和不适应，以及对自身飘零孤苦的身世有感，而愈发使得人们觉得萌生生命无意义的厌世观。呆伯〈偷生日记（节选）〉也有此类叙事，此篇日记体小说开头便点破题目，如此叙事：

屈指一捏，我脚踏番地，四个月加十八天了。吾将归歿？抑将老死于此？啊！断不容再在此地偷生了！断不能再在此地偷生了！归呀！归呀！归去看看死友们坟墓上的草儿，生长了几许。这才是正经事。（方修编，1970，页219）

主人公透过日记体的方式，抒发移民到马来亚后内心的苦闷，并将其生活形容为偷生。由于中国当时政治经济的压迫，许多人被迫逃到南洋谋生，移民到马来亚后，或是对马来亚环境的不适应，或是觉得自己飘零的身世感到孤苦，或是被迫从祖国逃离郁郁不安，文本中总是显露出郁闷的心理。文中反复叙述“不生不死”（方修编，1970，240页）的糊涂状态，觉得自己“住在鬼地方，比在中国做反革命的工作还更可耻些！”（方修编，1970，页223），因此不愿老死于此，并发愿回归祖国。

战前马华文学中也有作品描写女性的精神困境。〈峇峇与娘惹〉描写了一个外来人物阿美——即峇峇的妻子、老商人的媳妇。阿美原为峇峇的表妹，后嫁给峇峇为妻后，发现峇峇与姐姐娘惹乱伦，和自己结婚全为掩人耳目，并向自己提出离婚后。阿美因为自己“既受欺骗于前，复受侮辱摒弃于后”，觉得无颜面活在世上。她觉得自己已无法承受这种痛苦而想自杀“离开这黑暗的世界”（方修编，1971，页45）。阿美所承受的冤屈和婚姻的不幸，认为自己是可欺 可怜的弱者，让她感觉已无法活下去，但又想着要复仇，因此陷入矛盾的思绪中。

以上这类负面心理，不仅使得他们觉得生活了无生气，更在文学中屡次以“死”比喻马来亚的环境，如〈偷生日记（节选）〉中便有“死在死气充遍了的南洋”（方修编，1970，页236）、“在遍地充满着奴隶性变态底生活的空气里”（方修编，1970，页221）的描述，浪花的〈邂逅（节选）〉中觉得自己已是“人间地狱的奴囚”（方修编，1970，页269），以及亚庸〈侠姑〉称工厂上班钟声为“催命的血钟”（方修编，1970，页252）。以死亡或死亡相关意象作为对马来亚或南洋的空间描述，以此抒发自身对于生活的感叹，以及表达对马来亚客观生存环境的不满。这样的负面情绪在〈偷生日记（节选）〉通篇小说中周而复始地循环、重复，甚至认为自己遭摒弃，处处感受到别人的白眼。

战前马华小说中精神死亡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颓废色彩，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功利考量之外，一种以感性主导的文学叙事，文本叙事围绕在自我，抒发自身由外围客观环境至内心活动的消极面。虽以隐喻方式对空间进行描述而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但抒情功能占据主导而强化了情感功能。

除了对自我的精神状态的描写，也有对他者精神死亡的叙事或庸众的反映。槐才〈血泪〉的主人公因反抗受伤入院后，对医院内的情景如此描述：

院中各房间的病人，大约皆已酣睡了，因为一些呻吟声都没有。他虽然断断续续地发出这低而颤动的哀音，但尚不能把这四周寂沉沉的空气打破。这好像是暗示说：在这黑漆一团，同胞们个个都是醉生梦死的国度，尽管你个人怎样的呐喊，怎样的奋斗，都是枉然的呵！（方修编，1970，页174）

文中藉由医院内的沉寂的空间描述，比喻人们醉生梦死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藉此反映出主人公激昂的反抗情绪，与众人“酣睡”和“寂沉沉”形成对比，形成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境。除了以上的纯粹描述，也有对众人实际情况的叙述，比如叙述人们对社会不公现象的不闻不问，其中〈猎狗（节选）〉中形容旁观英政府肆意猎狗的人群“引颈旁观，现出惊奇，呆滞的眼光”（方修编，1970，页261）；〈侠姑〉描述人们对于工厂女工被工头强奸时表示：“哦！这是他们的常事！工头强奸女工有什末稀罕，连人们都不加以干涉；我们有何能救得她、反讨苦吃呢？”（方修编，1970，页253）。〈猎狗（节选）〉和〈侠姑〉中对于人们袖手旁观行为的描述，主要是为了突显人们“没有明瞭他自己本身疾苦”（方修编，1970，页262）。另外，小说也有描述庸众没有意识到社会改革的重要性，比如慧聆〈铁牛〉叙述铁牛儿子参与反抗运动被枪毙，旁人没有体恤铁牛，反而指摘他。借此我们可以看见，战前马华文学也借助精神死亡为基调，对他者进行描述，形容人们对于别人所承受的痛苦，也只旁观而无及时给予援手，即便是社会运动，没有给予响应反而指摘，形容他们已失去高级思维活动，“正觉不到自己痛苦的来源”（方修编，1970，页230）。

（三）生命自省：生命启发与省思

除了身体死亡和精神死亡两者对死亡的叙事外，死亡叙事最为受人们所关注的，可说是死亡对生命带来的启发和省思。而且特定的社会文化与环境，必定会产生与环境相关的生命启发与省思，而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前进者，将其实践在文学创作中，以文学方式表达思想，以思想丰富文学表述。在风雨飘摇的战前马华文学中，死亡给予作者什么启发？作者又如何如何在文学中体现了他们对于生命的看法？

战前文学中有部分作品叙述了生命的脆弱，如〈猎狗〉中主人公因目睹殖民政府执政者猎犬而引发其感叹生命的脆弱：

他们不管有牌，或没有牌的，只要遇在他的眼里，便一枪结束了它的性命。……这样，在一刻间，在这里便丧失了五个有生命的生物，刚才又响一枪，恐又有一只犬要被击了的。

先生，他们讨猎狗的缘故，便是因为近来这些犬在夜里时常吠着，扰害了他们的沉睡，惊破了他们的美梦，便遭受了他们的惨杀。唉！犬的生命这般脆弱，我们的如何尝不是这样。他们把这些扰人梦寐的犬杀掉，因为这些犬对他们是没有需要的，……。我们这般人的生命又何尝不如此。（方修编，1970，页262）

执政者肆意猎狗，听到一声枪响就代表一只狗儿结束性命，且猎狗的原因仅仅是狗扰了“他们的美梦”，主人公因此而感叹到狗的性命是脆弱的，同时藉由狗的死亡继而引发其敏感思绪而发出对于自身遭遇以及生命的感叹。这样的体悟与其说是作为对生命本质的体悟，不如说更多的是对当时马来亚社会环境相关的反映，以及对身处马来亚华侨处境的感叹。〈猎狗〉中在评及执政者肆意猎杀的行为时说，“就是例外，也没有人敢干涉他，因为这块土地是他的。”（方修编，1970，页261），暗示着华侨在马来亚寄人篱下的状态，以及执政者对于在地华侨的肆意剥削。除〈猎狗〉之外，还有多篇死亡叙事的文本皆有以上的感叹，如〈偷生日记（节选）〉中以“想不到我的短促的生命，已备尝了漂泊的滋味了，又复再尝尝金钱压迫的痛苦！”（方修编，1970，页227），叙述主人公因漂泊和金钱而感叹生命苦短；〈邂逅（节选）〉中描述人力车夫的工作“一不小心便很容易的送掉生命，单就这酷热的天气是足够使他憔悴生病”（方修编，1970，页277）；〈热闹人间〉也感叹贫富悬殊，“穷人的生命，是灰尘一样的呵！”（方修编，1970，页201）。可见风雨飘摇的时期，人们就自身处境多感叹生命的脆弱，并诉诸于文学文本之中。

除了对于生命的感悟，也有对人生和生活遭遇的感叹。〈悲其遇〉中也有类似的人生感悟，叙事者带着杜平来到坟场找已故友人的坟墓，而有一幕这样的描写：

不多步到了葬地的下路，路地头铺满紫红的落英，映着夕阳的斜晖，越加使我感觉凄伤。我也本非是人生道路上一个得意者，也是朵紫红的落花，于是乎多少前程失意的图片涌上心头，也下意识不知觉地仰天的怨叹起来。（方修编，1971，页438）

寻墓途中的满地落英，让主人公触景伤情，感怀自己的遭遇，并由此感叹“人的一生与地面的落花实在没有什么分别？”（方修编，1971，页438）。这除了是个人对于自己负面遭遇的抒怀感叹外，还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感受，可映衬出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就如文本中所说，“感怀身世，是现在的人免不了的”（方修编，1971，页439）。

这种文学中对生命脆弱的感叹叙事，除了少部分的颓废色彩外，大多都由此负面感叹进一步转化为正面的人生愿景。从死亡叙事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文本中以死亡事件作为基调的负面情绪，进而转化为对人生和社会的美好憧憬。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美好憧憬除了表达作者本身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愿望，也投射了对自身生命意义的叙述，表达为改革社会而付出自身性命的意愿，并进一步称这就是生命的“使命”和“责任”。例如〈血泪〉中，惨案的奋斗者被枪弹所伤入院，虽经医疗但仍不住地流血。主人公毫不在乎，并说：

“流吧！尽情的流吧！我愿你把那人间的一切冷酷罪恶洗涤得干干净净！流吧！尽情的流吧！我愿你浸入我那班冷血的同胞心窝里去，把他们变成一个一个的热血的奋斗者……死了！死了！算什么！宁奋斗而死，勿忍辱偷生！”（方修编，1970，页173-174）

主人公愿以自己的血来洗涤“人间的罪恶”和同胞的心窝，好让同胞共同群起反抗，同时，主人公认为死无可畏惧，宁可死也不愿偷生，表达了愿以生命唤醒同胞共同为社会改革运动奋斗的生命志愿。〈偷生日记（节选）〉主人公和友人睽在信中讨论另一位参与改革运动而牺牲的友人灼星时有一段描述：

“灼星兄的责任已尽，他对得住世人了！他对得住自己了！同时他已可少受人世的痛苦，多享些乐国的风光。

“他放下一切责任和着许许多多的同志，跑向那快乐的国度里去，享受那无尊卑，贵贱，男女老少之别的自由自在的幸福！”

“他实没有死！他实在已永生！”

“已死的已惨死的只有我们所天天眼见的一个一个的走户，他们满身缠满了枷锁，他们四周布满了恶魔，他们是无生气地只是一具一具蠕蠕地变更变更位置吧了！”（方修编，1970，页224）

主人公友人睽相信人生于世的责任，只要尽了责任，便可问心无愧，即便牺牲了性命，也可在“乐国”享受难以在人间享受的幸福。此外文本中还以行尸走肉作为对比，藉此强调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存活。文中主人公赞赏友人的看法，并称这是进步的思想。〈偷生日记（节选）〉中表达的人生观即是以生命的责任和使命完整了生命的意义，是战前马华文学作品藉由死亡叙事而产生的人生或生命本质的思考，是对于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表现出的生命终极关怀，仍然以社会关注为主，例如〈偷生日记（节选）〉便是以社会改革作为生命的责任。〈猎狗（节选）〉的主人公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之后，也发愿“应该确切地实现自己的使命，任务，去完成自己工作，促进时代的实现，是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类间不会再有不平的状态发现”（方修编，1970，页263）。〈他的美梦醒了〉描述男主人公岩影陷入恋爱之中，荒废学业和改革事业，认为“没有爱的革命是不值得牺牲生命”（方修编，1971，页69）。后来发现女方家庭早已为其定下婚事，在女方的劝告下，决定“牺牲自己去争取弱者的成功”，并高呼“流血！努力！奋斗！”（方修编，1971，页87）我们可以从中得见五四革命运动对于战前马华文学和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于改变既有社会作为个体生命责任的观念极其强烈，他们以文学鼓吹以生命为革命为社会为弱势群体服务，批判社会各种不公现象，社会改革的期望成为他们生命延续的支撑点。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战前马华小说中死亡叙事的初步分析和归纳，发现这些死亡叙事皆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脉络相契合，同时又以微观的方式与历史叙事互补，使死亡叙事文学作品的论述更为丰富有内涵而又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某个侧面，值得我们关注。

以上三种死亡叙事都刻画出战前马来亚华人的生活和精神困境，同时也通过死亡叙事，体现出对死亡和生命的体悟。从这些死亡叙事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得见身体死亡和精神死亡叙述了当时马来亚华人徘徊与生死的困难处境，即区区为满足三餐温饱身心自由愉快的生存最基本条件；通过对这些处境的叙事，作者透过小说中的角色发出对生命的感叹，借此引发生命省思，呼吁人们不以个体生存为目标，谨记生命的意义和对社会的责任。

在战前马华社会中，非自然死亡极为普遍，而战前马华小说的死亡叙事表达了人们在面临死亡时的感情和思想，部分叙事虽以直白的生命意义呼吁和宣扬而略显文学性不足，但对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却有深刻的启蒙和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 [美]安敏成著,姜涛译(2001)。《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程金城(2002)。生命过程的解释与对付困境的努力——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特质和价值意蕴及其嬗变。《甘肃社会科学》,5,页82-88。
- 范若兰(2005)。《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方修(主编)(1970)。《马华新文学大系(三):小说一集》。星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 方修(主编)(1971)。《马华新文学大系(四):小说二集》。星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 黄锦树(2012)。马华文学与(国家)民族主义——论马华文学的创伤现代性。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主编),《马华文学与现代性》(页51-68)。台北:新锐文创。
- 王慷鼎、杨松年(1982,2月22日)。新加坡战前华文报刊系年初稿。《南洋商报》。取自<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Page/scjp19820301-1.1.26>,页29。
- 王慷鼎、杨松年(1982,3月1日)。马来亚战前华文报刊系年初稿。《星洲日报》。取自<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820301-1.2.49.1.3?oref=article-citation>,页26。
- 王小环(2012)。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研究综述。《名作欣赏:中旬》,3,页47-49。
- 颜清湟(1991)。《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 杨松年(1986a)。《战前新马文学所反映的华工生活》。新加坡: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奋斗报(Fern Toh Pau, Singapore 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 杨松年(1986b)。《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新马华社研究丛书)。新加坡:同安会馆。
- 杨松年(1988)。《新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新马文学论丛6)。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新加坡: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
- 杨松年(2000)。《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